



芦花飛 歌声扬

LU CHAI HUA FEI
GE SHENG YANG

——雪飞自传





1941年4月盐城抗大五分校留影

前言

雪飞同志原名皋宇，生于1926年1月，江苏滨海人，193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离休并享受厅局级政治、生活待遇。

雪飞同志1942年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盐城五分校。少年时代的她在苏北农村学会了不少高亢的号子和优美的民间小调，运用文艺形式宣传革命教育群众，她自编自唱富有革命内容的苏北民歌受到了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1942年至1949年3月曾先后在盐阜文工团、阜宁文工团、建阳文工团、苏北文工团从事民间歌曲的研究和演唱，革命的大熔炉把年轻的雪飞锻炼成为人民喜爱的民间歌手，人民称她为“苏北的梅兰芳”。1950年任职于苏南军区文工团，参加华东军区文艺汇演荣获独唱三等奖（当时未设一等奖）。1952年7月，参加中国第二次赴朝鲜慰问演出，1953年12月到江苏省歌舞团，她先后任省音乐协会副主席，江苏省第五届政协委员、江苏省歌舞话剧院艺委会副主任，歌舞团副团长、歌舞剧院副院长。1956年7月，雪飞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间文艺调演，她演唱的苏北民歌《拔根芦柴花》受到了热烈欢迎。接着又被选送到中南海怀仁堂给中央首长演唱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赞赏。1959年10月赴北京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1981年5月，雪飞率江苏省歌舞剧院民乐团赴日本访问演出，先后在大阪、名古屋、丰田等地演出近30场，她演唱的《拔根芦柴花》等歌曲深受日本观众的欢迎。

《拔根芦柴花》、《杨柳青》被中国唱片总公司收入《20世纪中华名人集珍藏版》，其中《拔根芦柴花》还被选入江苏省教委中小学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小学音乐教课书中。从四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风云四十载，她为革命和文艺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党和人民也给了她很多荣誉，她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03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又为她颁发了“五个一工程奖”以此来表彰她对文化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突出贡献。

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里，雪飞同志能够始终做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她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无私奉献，具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她生活俭朴，对子女要求严格，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她关心爱护后辈青年，德艺双馨、德高望重，为革命和党的文艺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雪飞同志于2012年3月25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86年。

雪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艺术事业奉献的一生。她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芦柴花
LU CHAI HUA
FEI
GE SHENG YANG



1951年苏南军区文工团留影



芦花飞歌声扬
LU CHAI HUA FEI
GE SHENG YANG

我的一生

WO DE YI SHENG

我原名皋宇，祖籍苏北阜宁县皋滩村（现属滨海县）。我出生前后，苏北灾荒连年，很多人家都逃荒到江南（苏州、上海）。我是1926年1月在上海高浪桥出生的，那天正是农历冬至，家人给我起了个乳名叫冬兰。听我奶奶说，我未满周岁母亲就去世了，因此，母亲的形象，我一点也记不清楚了。我是由奶奶和父亲抚养长大的。当时我们家很穷，父亲皋锡地（即皋地）在上海一家铁工厂做工，拿的工钱很难养家糊口，所以奶奶有时到铁路边去拾煤渣，到菜市场去捡些菜皮回来吃。有一次我父亲在参加庙会时踩高桥，不慎跌坏了腿，因无钱医治终成残疾，工厂也不要他了，父亲只好在家门口摆了一个摊子修理自行车，此时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了。



1941年4月在盐城抗大五分校留影

我们在上海，共住过三个地方，即高浪桥、眉州路和高昌庙。都因为房租贵住不起，才搬来搬去的。在这期间，时常有人来找我父亲谈话，很神秘，父亲私下还关照我，到外面不准乱说。其实我知道他们和我父亲一样都是好人。

当时由于外国人在上海争霸，各种势力抢占地盘，时局很混乱，我们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奶奶成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的，我父亲就跟我奶奶讲，上海住不下去了，我们就到苏州找亲戚帮帮忙吧。所以我们就搬到苏州阊门广济桥，亲戚帮助我们租了间房子，父亲还是替人家修自行车，就这样在苏州又住了一年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上海、苏州的形势也开始紧张起来了，听说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所以我们祖孙三人只好跟着逃难的人群回到了滨海皋滩村。其实在老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依然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一间顶头屋，祖孙三人住在一起，屋基周围二三分空地，由奶奶种点麦子和蔬菜，父亲只好带我到离家四五里地的蛤蜊港向亲友借了间屋子，帮人家修理自行车。街上有人家办婚丧喜事，父亲就去替人家点汽灯，挣点小钱勉强度日。

我小的时候由于家里穷，逢年过节不像有钱人家杀猪宰羊，蒸糕做馍，小孩穿新衣戴新帽，放鞭炮，欢天喜地过新年。而我们家只有把奶奶过去拾回的小麦，磨点面粉做几块饼吃吃，就算过年了。因为母亲去世早，所以奶奶和父亲都特别疼爱我，记得在我八、九岁时，父亲觉得我长大后一个字不识不行，就把我送到镇上的私塾里读了一年多的书，我才认识了一些字，有了一点文化。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听家乡的淮剧和秧歌号子，每次走在路上，听到田里传来秧歌号子，我都会跟着一起唱。每逢过年乡里的大户人家都会请来戏班子唱淮戏，我都会跑好远的路去听戏。邻居到家里来串门，经常会对我说冬兰把小曲本拿出来给大家唱一段，我就把学来的歌和戏唱给大家听，他们都很喜欢听我唱。

我父亲因腿脚不便，到外面的事都由我搀扶着他，或帮他去做。当时经常会有些不速之客来到我家，他们谈话很神秘，不准我听，还叫我在门外看着。还有几次让我替他们送信到阜宁县城的一人家，临走时千叮咛、万嘱咐，要小心，千万不要弄丢，不让别人知道等等。当时我并不知道父亲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有一天黄赤波（建国后曾担任过上海市公安局长）突然到我家找我父亲，并要我为他送一封信到阜宁城外的某个人家，我圆满的完成了交给任务。（文革后，黄赤波同志到南京来，他让江苏省公安厅长洪沛霖把我找去还谈到过此事。）也就在这个时候，镇上的曹加明从延安回来了，他和父亲早就认识，他回来后讲了不少外面的形势，并说要带一批人去参加革命。他经常到我家来找父亲。并和我父亲一起，常找一些人来，跟大家讲形

势，讲抗日，宣传革命道理，传送情报，护送地下工作者等等，因此我们家几乎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站。有时他们在屋里谈话，让我在门外望风，当时我年纪小，不懂什么，但我都能按照大人教的去把事做好。

我父亲出身贫苦，未念过书，没有文化，但他为人耿直，乐于助人，特别是他那种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我就是在父亲的这种精神和思想的熏陶和培育下，十四岁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九年秋天，日寇已占领了我国很多地方，阜宁县城也被鬼子占领了，时局很紧张，加上那年海水倒灌，淹没了农田，粮食几乎颗粒无收。此时曹加明和我父亲商量，由曹加明带领他的妻子、儿子、侄女（曹云）和我，还有镇上的几个年轻人先到沐阳那边去找我们的部队。当时我还记得，临行前奶奶哭着舍不得让我走，父亲对奶奶说，让冬兰去吧，家里缺吃少穿，如果日本鬼子来了，更不会有好日子过，只有让她参加革命，才会有前途、有出息啊。

第二天早上，我就跟着曹加明一行人走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穿过阜宁与草堰之间的封锁线，往沐阳方向走去。此时正是收获花生季节，田里有一堆一堆的土墩子，经过数天的长途跋涉，我们到达了沐阳大中集。找到了淮河大队，大队长万金培接见了我们，他对我们很客气，很亲切，使我们感到像回到家一样。

到部队后，我被编到班里去了，当时部队有任务，要过陇海路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还未穿过铁路线，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部队包围了，打了二天二夜的仗，我们的部队分头突围冲过去了。后来我和曹云等几个年纪比较小的同志不便随部队行

动，就把我们送到教导团去学习了。通过两个多月的学习，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使我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学习结束后，我们被分到涟水县一区做民运工作，主要任务是向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以及要加紧生产等道理，并帮助群众做事，参加劳动。

1941年2月涟水县委召开党代会，我们民运工作组人员也参加会议，会上号召青年人去盐城参加抗大学习，我和曹云等十几个人报了名，经过领导批准，我们出发了。走了几天的路程，才到达了盐城。

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总校在延安，盐城是抗大五分校，我们到达盐城后，第一期学习刚结束。第二期是从1941年4月到1942年3月，学员共有1560人，学校按军事编制，共有13个队，下设排、班。我和曹云被分在女生队三排。从此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每天早上5时起床，上操跑步，早饭后上课。课程有政治、文化和军事，还有社会科学和生理课。给我们上课的教员有专业老师，还有部队首长。刘少奇、陈毅等首长就曾给我们上过课。晚上我们还要轮流站岗，生活很紧张，但精神感到非常愉快。

1941年6月，日伪分几路进攻盐城，我们抗大转移到盐东一带，只要住下来，就照常上课，后来又转移到东坎一带。1941年9月学校从阜东东坎迁到阜宁硕集镇附近（军部所在地），恢复正常上课了。1942年3月学

1946年春在淮安召开的华中宣教大会时徐佩琴、陈德芬、雪飞（右一）、苏华合影留念

业结束，学校举行了毕业典礼，参加者约1200多人，其中女生200多名。

我们从一九四一年四月进抗大，到一九四二年三月学习结束，通过一年的学习，使我的政治思想觉悟、文化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就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我一定要紧跟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抗大的学习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使我坚定地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四二年三月，抗大毕业后，同学们大多数回了原单位，也有人被分到新区去开辟工作。我和我们排的排长里明同志（上海棉纺厂的童工，地下党员）被分在盐阜区陈集乡做妇女工作，为了使群众踊跃参加会议，我们敲锣打鼓，唱革命歌曲和民间小调，用文艺的形式去吸引群众。由于我在少年时代就会唱不少的秧歌号子和家乡的淮剧，领导发现我唱歌很好听，就将我调到刚成立的盐阜文工团了。它是我一生事业上的转折点，从此开始，我走上革命文艺的道路。

盐阜文工团成立于1942年春，成员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少是从敌占区和大后方来的，有的是从机关单位调来的，还有的是本地区的知识青年。据我的记忆：团长是一位老干部名字叫邓野。文工团下设话剧、合唱两个队。队长：凡一，指导员：朱茵，导演：方隍，音乐教员：孙琳、金虹，还有史秉直、王东藩、长虹等。我进了文工团后，当即投入紧张的业务学习和排练活动。早晨由音乐教员带着我们在村东头的树林里练习发声、吊嗓子，上下午由老师给我们上业务课，讲音乐、戏剧方面的业务知识。

一九四二年底，因日寇要来扫荡，上级决定解散盐阜文工团。文工团成立时间不到一年，但它却培养了不少文艺人才。在盐阜区参议会成立大会上演出了闻名遐迩的《黄河大合唱》和话剧《母亲》，都受到了盐阜党政军各级领导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的一致好评。该团在解散时，盐阜区党委宣传部长王阑西决定由凡一、彷徨、长虹和我四人组成“淮剧研究小组”，去阜东一带作调查研究和向民间艺人学习，以便让淮剧更好的为现代生活和群众服务，最后因时局紧张，工作未能很好的开展起来，但它对后来用淮剧这一形式反映新民主主义内容，配合各项中心任务，起到了积极和促进作用。

一九四三年春，盐阜地区的反扫荡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盐阜区对敌斗争形势有了好转，区党委领导为了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要求各地加强文化艺术工作。全区九个县，阜宁县率先成立了文工团，区党委王阑西部长指示由县文教科黄其明具体抓这项工作。黄其明同志从组建文工团到编剧、排练，都亲自动手。文工团先后调进陈亚夫（指导员）、薛萍、董叶以及原来在盐阜文工团的史秉直、王东藩和我等。又从本县羊寨镇上吸收一批知识青年：汤沸波、吕波、陈桂楠、王健、吕荣中等同志。接着又把王博夫、李英、江浩、郑兰玉、吴福堂、杨联三、琴师王云樵、高宽之等也先后调进来了。文工团在演出前先打一下开场锣鼓，以吸引观众，还从社会找了几个民间艺人来帮忙。

此时黄其明也将剧本写好，剧名为《照减不误》。该剧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淮剧，抓住当时政治经济斗争中突出的中心问题一减租减息作为题材，深刻地揭露了地主明减暗不减的阴谋诡计，号召农民起来和地主斗争的事情。

一九四三年八月我们演出了第一部淮剧《照减不误》，我在剧中扮演了地主的二奶奶，由于我和同志们在排练中尽了最大的努力，充分地表现了角色的内心世界，加上我的嗓音好，演出不但受到农民和战士的欢迎，还受到党政军各级领导的赞扬。该剧对当时减租减息斗争，教育和组织农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该剧演出后反响强烈，延安和地方一些报纸对这次演出都作出了报道和评论。

首演成功了，群众奔走相告，还把十几里以外亲朋好友喊来看戏，大家像赶大集似的。而且农民们还把戏中的人跟自己相比：“我就是周大”，庄上的某某人就是“赵管账”。我好几次走在路上，群众在背后就指指点点说她就是张百万（地主）的二奶奶。这说明了群众的爱憎分明。



1943年底演出淮剧“照减不误”剧照



1944年淮剧《绝头路》剧照

“照减不误”剧目，也深受战士的喜爱，部队从前线打胜仗回到后方休整，我们就进行慰问演出。我们的战士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子弟兵，阶级觉悟爱憎分明，一次，戏演出到最后斗争地主一场时，他们愤恨极了，有一个战士忘记是在看戏，竟然端起手中的枪，准备向地主射去，幸被身边的班长拉住。“照减不误”剧目演出后，盐阜区党委要求其他县也成立了县文工团并演出这一剧目，而且阜宁各地成立了农村剧团，淮剧改革在盐阜各地形成一股热潮。这对当时根据地的各项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起到配合和推动作用。

此时黄其明同志的第二个剧本又写好了，剧名为“路遥知马力”，该

剧反映国民党反动派与当地封建势力互相勾结、敲榨欺压百姓，以致民不聊生，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老百姓翻身得解放的事情。此剧后来被我国戏剧家阿莫同志改编成独幕淮剧《渔滨河边》，演出后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在淮剧《渔滨河边》中扮演“郑廷珍”一角，她是一位秀丽、纯朴的农村姑娘，她为了帮助家中多挣几个钱，在外面做针线活，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一个连长的欺侮，她气极了跑回家来说：再也不干这个针线活了。我在演出时对旧淮调的腔调和唱法作了大胆的改革，将哀怨的韵律改为较舒缓的腔调，运用倒板，在后台即唱起“郑廷珍一路上气冲冲”，把角色的内心世界充分显露出来，使人听了觉得优美悦耳。因此往往在演出到此处时，台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以后我又演出了反特剧“绝头路”、“懒龙伸腰”等，都能根据剧情人物性格的特点，在角色的处理上采取了不同的表演方法和唱法，恰如其分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当时因条件有限，夜间演出时没有扩音器，我的声音响亮悦耳，歌声能传到几里路以外，深受当地老百姓喜爱，被他们称赞为“苏北的梅兰芳”。

音乐家章枚、贺绿汀两位同志，在淮剧的改革工作方面，也做过许多工作，他们帮助我们上课，讲发声技巧，什么叫旋律、节奏等等音乐理论知识。章枚同志还教我们怎么记谱，并把我唱的“新淮调”悲调记下来，让别人学唱。实践证明阜宁县文工团在淮剧改革工作是成功的，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三师黄克诚师长，他既要领导打仗，又要管党政工作日理万机，在百忙中还很关心淮剧改革工作，抽时间接见我团领导和主要演员，帮助解决幕布等演出用品，在物质上给予大力支持，在精神上给予鼓励和帮助。盐阜区党委领导及宣传部长王阑西等也特别关心大家，并不时地作出各种指示，使我们工作方向更加明确，信心更强了。另外由于具体抓淮剧改革工作的黄其明同志，他天资聪慧，有胆有识，勤奋工作，有知识，有才能，亲自动手，工作很有成就。在我们阜宁县文工团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大家在实践中加以发挥和创造，使新淮剧深受群众的喜爱。至此阜宁文工团的同志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各自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盐阜区九个县的文工团先后共举行过两次集训，第一次是1944年9月，在阜宁县三庄马。主要是学习毛主席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交流工作经验和今后的工作计划。第二次集训是在1945年6月—8月，在阜宁县扬集镇，共有300多人，主要解决文艺思想和作风问题，在业务上把学习和研究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还排演《放下你的鞭子》、《渔滨河边》、《刘桂英是一朵大红花》等，这次集训为迎接抗战胜利，进入城市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进行的8年抗战终于胜利了。我们大家个个欣喜若狂，连夜赶排节目《日本鬼子投降了》等活报剧。第二天在扬集镇驻地及附近农村进行宣传演出，并于次日在盐阜专署所在地—罗桥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演出了活报剧《日本鬼子投降了》及《刘桂英是一朵大红花》。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苏北区党委决定集训告一段落，正式成立苏北文工团，并分成二队：淮剧队和话剧队。淮剧队去涟水，话剧队去两淮。我被分在淮剧队。

当我们淮剧队到涟水时，城里的日伪军已经逃离，我们当即搜集材料，几天内即演出了淮剧《解放涟水城》。不久，我们又去了淮阴与话剧队汇合在一起，此时因为话剧队有的同志被抽调“北上”，于是就让我参加了《淮阴之战》的演出，我欣然接受了演出任务。那时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切服从领导分配，不计较主角、配角。该剧场面宏大、剧情紧张、表演真实感人，不论在艺术性还是思想性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因此获得了各界的一致好评。通过参加该剧的演出，打开了我的眼界。

为了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团的大部分外来干部被抽调，跟随新四军三师北上。因此团里人员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和王东藩仍在原团。此时经过五地委组织部批准，我们俩结婚了。按规定发给我们的几块钱，就在住地马源大酒栈买了些鱼肉等菜，请团里的同志简单地吃了顿便饭。

1945年底，我军攻克盐城南侧的伍佑镇前夕，为了瓦解敌军的士气，剧团领导派我和另外几个同志到前沿阵地去向敌军喊话，我们白天不断的对着据点喊话、宣传，动员敌军投降，但被围困在据点里的伪军很顽固，趁夜晚企图突围，一时枪声大



1951年在苏南军区文工团
与丈夫王东藩合影

作，火光冲天，敌人举起明晃晃的大刀，在炮火掩护下咆哮着向镇外冲去，因为我们是非战斗人员，没有武器，就撤到大路一边，在敌人冲出据点后，幸好我军主力部队赶到，将敌人一举歼灭，才使我们化险为夷。

1946年3月中共华中分局在淮安召开了华中宣教大会，及时将文化教育工作从为抗战服务转向为新民主主义服务。大会着重解决认清形势和当前的任务，以及文艺怎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大会还专门安排各地区文艺团体演出许多剧目，如由华中军区文工团《李闯王》、实验京剧团的《风波亭》、苏中前线话剧团的《甲申记》，我们苏北文工团演出了《淮阴之战》、《渔滨河边》，六分区文工团的话剧《搅碗》等等。这是一次空前的文艺大会。大家对演出的有些剧目曾有很大的争论，如《刘桂英是朵大红花》，形成了一次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会，通过此次汇演，我学到了很多東西，受益匪浅。

华中宣教大会结束后，我和王东藩向领导请假，回阜淮老家探望我的祖母和父亲，到家后我们告诉祖母和父亲，这几年我们在工作生活的情况，他们听后非常高兴。在家期间，我们也请郎中为父亲看病，但父亲由于双腿残疾多年，已无法痊愈了。父亲说“你们就安心在外工作，不要担心我了，你们在外好我就高兴”。因此我们把身上仅有的几块钱留下，就走了。其实我知道父亲是个很要强的人，在上海铁工厂工作的时候，他就恨资本家，对工人阶级非常亲，回老家皋埠后，他虽身患残疾、疾病缠身，但对村上有困难的穷人还是尽力帮助，到这时我才知道，我们家曾经是地下交通联络点。我探亲回部队不久，我父亲就去世了，我们因工作的关系也未能回去给他送终，但我会永远地怀念着他。

我们回淮安后，团里正忙着贯彻党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团里决定让王东藩等几位同志参加淮安石塘的土改试点工作，而我则因怀孕快要生产住进了医院。

1946年秋，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苏北解放区，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文工团分散到各县就地坚持斗争。我和王东藩带着孩子回到盐东县，江浩同志也跟着我们来到盐东，江浩在县中上政治课，做学生工作。我上音乐课，帮助学校排演《白毛女》，王东藩在盐东县国军军部做敌工工作。

1947年春，工作安定下来后，我随即向党组织打了入党申请报告，经盐东中学校长赵定和校党支部的政治审查，鉴于这几年我在各方面的突出表现，组织上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由赵定和江浩同志做我的入党介绍人，经学校党支部大会通过，县委批准，我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多年追求的夙愿终于得到了实现。

大约在1947年8月，盐东县负责人找我们谈话，跟我们说：华中工委多次来电要调你们三人回去，再不放你们走，恐怕我的“乌纱帽”都保不住了。他们要求我们随即赴合德向华中工委报到。当时苏北文工团又恢复成立了，正在射阳县合德镇排练演出《白毛女》。时隔不久，情况又有了变化，决定苏北文工团要与十二纵队文工团合并，因此一部分人到了十二纵队去安徽，另一部分仍留了下来。王东藩和江浩被调到华中党校学习，我被调到苏北公学当音乐教员。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北地区进行了几次梳篦式地扫荡，但都被我军给彻底粉碎了，最后一次扫荡时，我们沿着海边向北撤退，几乎快要到了陇海线，但是国民党的进攻还是被我军打败了。少数残兵败将退到江南去了。王东藩和江浩于同年11月从华中党校学习结束后，和我一起被调到苏北军区文工团工作，而此时我才了解在华中学校学习的一大批干部是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做准备的。1948年底，我和王东藩到达淮安苏北军区文工团住地时，已经有不少同志如江浩、任复、金毅、刘川等同志已经来了，大家都正在忙着准备渡江的各项工作。

1949年3月20日我们奉命从淮安出发，徒步行军。路经宝应、高邮等地，于3月底到达泰州塘头镇。根据上级指示正式建立苏南军区文工团，因此原苏北军区文工团即被更名为苏南军区文工团，并要求我们跟随大军渡江。为了渡江后能跟上形势要求，同志们认真学习有关政策和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我们于1949年4月26日在八圩港渡江，28号到达无锡，住在师古河边，一、二队隔河相望，每天早晨都有同志在岸边练唱，大家白天上街贴标语，画墙画，有的同志背着腰鼓边跳边唱。城里的老百姓从未见过这样热闹的场面，纷纷驻足观望，



苏南军区文工团下农村留影

一边感到新奇，一边点头称赞着，给这座古老的纺织城增添了不少亮点。

随着形势发展的变化，工作也必须走上正规化，所以队部派了好多同志（如刘川、任复等）跟随进攻上海的解放军部队抢先进城到音专、剧专及舞蹈学院招收各种专业人材火线参军，还将一些原在大后方的著名演员、导演招来无锡参加我们的队伍，再加上原来在老区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因此我们的队伍空前壮大起来了。

我们一开始就排演了大型歌剧《赤叶河》，并从过去主要在街头广场演出到走向以剧场演出为主的正规化方向。与此同时又组织一批人员下乡、下连队为农民和战士服务。在农村我们发动农民群众起来诉苦、反霸、土改、剿匪、建立农会，把乡村政权建立起来，还顺利地完成了“秋征”任务。

那年过春节时，军区指派我们文工团代表军区去苏南行署副主任荣德生（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父亲）老先生家拜年，当我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到达荣府时，市民们都前来观看，荣老先生十分高兴，这样我们文工团也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尽了一份力量。



1952年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全体团员

在南京举行了华东军区文艺体育大检阅，我参加了这一会演，演唱了我平时练习的几首歌曲《幸亏来了共产党》、《翻身道情》，并获得了三等奖（当时未设一等奖）。因此我认识到通过在苏南军区文工团的实践和锻炼，不但增加和提高了我在音乐方面的理论知识，也为我在独唱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对从事文艺演唱事业充满了信心。

1952年8月上级决定派我参加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当时我已有4



1952年7月在无锡荣巷苏南军区文工团，赴朝前夕留影

50年刚过，文工团又排演了话剧《红旗歌》，其余人员则下部队、去工厂、到农村，忙得热火朝天，而我自进入了城市后，原来的专业与当前的业务不完全对口，加之我又有了两个孩子，因此不能跟同志们一样的工作，一直留在团部小楼上无所作为，心里感到很苦闷。于是我就去找军区部长谈心，反映我的想法，这位部长安慰我说带孩子也是革命工作嘛。后来在我的再三请求之下，就安排我在团部当书记员，管管文书档案。我没有办法只好一边做工作，一面找来一些音乐理论知识方面的书籍进行学习，每天坚持唱歌练嗓子，后来团里组织音乐舞蹈方面的专场，在无锡人民剧场对外公演，让我也参加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演出圆满成功。

1951年华东军区



1952年赴朝慰问团华东地区人员在朝前线合影

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刚出生不足半年，丈夫王东藩正患病住在部队101医院，我也深知赴朝鲜前线随时都会发生危险，但为了完成组织交付的光荣任务，我毅然决然地把孩子安顿好，告别了病中的丈夫，参加了赴朝慰问团。

我参加的是赴朝慰问团东线慰问一队，大多是华东各省市的人，其中有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上海歌舞团团长庄严，南京的孔罗逊等，还有不少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我们先在上海准备节目，然后去天津由中央派人来审查选定，最后又去沈阳学习如何防空、急救等知识，接着就奔赴朝鲜。

在去朝鲜前线的路上，敌机不停的轰炸，夜晚也不断地放照明弹，发现目标就狂轰乱炸，我们就趁敌机轰炸间隙熄，灭车

灯之际，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艰难的前进。由于运输困难，前线吃粮比较紧张，有时为了赶路，连饭也顾不上吃，团里的同志很关心我，在我口袋里揣两个苹果，让我又解渴又充饥。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赶到目的地。

在前线，志愿军战士看到祖国的亲人来了，既高兴又激动，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一个接着一个为战士们唱歌，从不叫一声累，那怕只有一个战士，我们也照样演唱。一次我刚唱完几首歌，有人喊，雪飞再来一个淮调给我们听听，我知道这位同志肯定是家乡人，我当即选了淮剧《渔滨河边》中郑廷珍的唱段唱给他们听，他们听的非常高兴，不停的鼓掌，此时我早已把饥饿和疲劳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赴朝慰问结束了回到国内，我们慰问团的所有成员根据上级的安排，又去华东地区，济南、合肥、南京、上海、杭州、福



1964年在南京演唱“拔根芦柴花”的剧照

州等地汇报演出了几十场，还到福建前线去慰问演出。从朝鲜回国后，在各地慰问演出近半年时间，才回到了家乡。回忆这段历史，真使我终身难忘啊！

1953年初，我转业到地方，调入江苏省歌舞团工作。我喜爱民间音乐由来已久，加上我熟悉它，了解它，所以到省歌舞团工作，就更能发挥自己的专长了。但是面对新的环境，我觉得自己必须要不断的学习，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我一面学习民间艺术，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一方面进行专门的业务训练，上夜校学文化，钻研音乐理论，观摩各种文艺演出，同时还注意西洋声乐的精华。经过不断地努力，我的整体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都有了很大提高。

1954年春，我们歌舞团举办了江苏省第一届音乐舞蹈训练班，我们选调了扬州地区、江都、高邮等地会唱民歌的农村姑娘到南京来，将她们所唱的民歌、小调、秧田号子，用钢丝录音带录下来，进行初步加工，再组织她们到扬州地区巡回演出。民歌《拔根芦柴花》就是其中的一首。后来此歌由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钱静仁 and 音乐家费克经过半年多的精心修改后，指定由我来演唱这首民歌。

1956年7月，

北京举行全国民间文艺调演，我在大会上演唱了江苏民歌《拔根芦柴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接着这首歌曲又被选送到中南海给中央首长们观看，当我在中南海怀仁堂唱完这只歌后，文化部周巍峙来到后台通知我，说周总理还想听我唱的淮调，我又上台演唱了《刘桂英是朵大红花》中的选段，总理上台接见演员时对我说：“家乡的民歌真好听啊”。

江苏省歌舞团是省级文艺团体，担负着全省的文艺宣传工作，演出任务非常繁重。我们团除了经常到全省各地去演出。还经常下基层、到工厂、农村、工地和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我们参加了中央组织的慰问团去大运河工地演出，参加省人事局专门组织的去徐州慰问解放军的大型拥军活动，逢年过节经常去部队慰问解放军，到一些大型工厂去慰问广大工人，到江苏洪泽湖劳改农场去演出，教育规劝失足者加速改造，改过自新。而《拔根芦柴花》这首江苏民歌是每场必演，不唱这首歌观众不让下台。记得有次在南京人民剧场演出，独唱了二首歌后，群众掌声不断，不让下台，我又加唱了两首歌，观众还是不让下台，只到唱了《拔根芦柴花》这首歌，才满足了



1959年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

大家的心愿，可见观众非常喜爱它。这首民歌我共演出了近千场次。

江苏民歌在我团演出中占有很重的份量，为了使我团民歌演唱富有特色，后继有人，我团专门组织了人员，由我带队到全省各县、农村等地，精挑细选了一批嗓音好、原声态的民歌手，把他们选拔到我们团进行训练和培养，这些歌手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了我团演唱民歌的骨干力量。

1961年电影歌剧《刘三姐》公映后风靡全国。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我们团也排演了歌剧《刘三姐》。并由青年演员主演刘三姐，节目上演后，在南京大会堂演出了十几场，为了进一步地提高上座率，省文化局长周邠决定由我来主演刘三姐，结果场场客满，提高了票价，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我团经常有接待外宾的任务。我们先后接待了苏联、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家的国际友人或外国的艺术团体，为外宾精心编排节目和演出。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七三年五月朝鲜平壤万寿台艺术团，该团来南京演出歌剧《卖花姑娘》，该剧组阵容大、道具多，演员和工作人员近百号人，从食宿、剧场、灯光等全程都是由我团接待。朝鲜歌剧《卖花姑娘》是朝鲜歌剧标志性作品，在艺术创作、表演和舞美设计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歌词的节律化和多声部伴唱是很大亮点，使我们吸取了不少好的经验。我们在接待过程中虽然很辛苦，但《卖花姑娘》剧组在南京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使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在十年动乱时期，我被打成为文艺黑线人物，《拔根芦柴花》这首描写劳动人民爱情的歌曲，被当成黄色小调，没有人敢唱了，歌曲改编者钱静仁、费克同志都受到了批斗和迫害。我也挨斗了三天，还抄了我的家。但我从不肯低头，不肯认错，在此情况下他们不让我演出，把我叫到传达室看大门，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时，让我骑上三轮车去拖服装。后来又把我们这些被审查的人员集中到南京农学院隔离审查，写材料交待自己的“罪行”。我被隔离了两年，后来工宣队、军宣队的同志和我谈话，要我写个检查，准备解放我，我对他们说，我在工作上有缺点、错误，但要我交待什么人的问题，我不会写，最后他们找人帮我写个什么书面材料，要我在会上读一下，就解放让我回家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又重新回到了舞台，当报幕员报告，下一个节目由雪飞演唱《拔根芦柴花》时，顿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我快步走到前台，向观众们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就放开嗓门纵情地演唱了这首歌，此时台下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1981年5月，我率江苏省民族音乐歌舞艺术团赴日本访问演出，先后在大阪、名古屋、丰田等地演出近30场，我演唱的《拔根芦柴花》等歌曲，也深受日本观众的欢迎。

几十年来，我演唱、发掘和研究江苏民歌近百首，虽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党和人民却给予了我很多的荣誉，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9年10月赴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十周年庆典。我还曾担任过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省第五届政协委员，省歌舞剧院副院长等职务。1982年上海唱片社专程来宁，邀请我赴沪灌录唱片，他们从历年演唱的近百首江苏民歌中选出37首，让我演唱，并分两次录制，向全国发行。后来北京中国唱片总公司又将我演唱的《拔根芦柴花》、《杨柳青》等最为流行的民歌，收入《20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里，使我的名字和这些从秧田里飞出的民歌一起传遍四海。

1985年在我即将离休前夕，我带领省歌舞团的同志去苏北滨海、响水、盐城、扬州、高邮等地作告别演出，以此酬谢和报答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2003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为了表彰我多年为江苏民歌做出的贡献，给我颁发了“五个一工程奖”，以此来表彰我对文化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突出贡献。

回顾我的一生，自己从一个贫穷的孩子，成长为一名革命的文艺战士，又成为著名民歌歌唱家，是党的多年培养和教育，也是我自身努力和奋斗的结果。我一生喜爱民歌、演唱民歌，为江苏民歌事业作出不懈的努力，也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我祝愿自己所唱的民歌《拔根芦柴花》香飘万里，永世留传。

永远的思念



1950年在苏南军区文工团合影

魂归来兮，昨日夜里梦见了你，一路走来，哼哼唱唱，忽儿又不见，亲人啊！你究竟在哪里，自你走后，我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你知道吗，我和儿女们都在日夜地思念你。

你出身贫苦，家中无房无地。在你不足周岁时母亲即去世，父亲因工伤重残在家，全靠祖母将你带大，多亏你有一个好父亲，他为人正派、思想进步，在他的影响支持下，你早年入伍，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你天生有一付好嗓子，从小在家耳濡目染家乡的小曲和淮剧，对民间歌曲心领神会。抗大学习结束后，党组织分配你在盐阜地区做群众宣传工作，由于你嗓音好，演唱的也好，1942年组织决定将你调进入盐阜文工团，不久我也被调入该文工团。我们在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在盐阜区参议会成立大会上，我们演出了闻名遐迩的《黄河大合唱》和话剧《母亲》，受到了盐阜党政军各级领导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的一致好评。

1943年为了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盐阜区党委领导经与阜宁县委研究，决定成立阜宁文工团，主要是以淮剧的形式来为党做宣传。此时你和我也先后被调入该团。我们一起演出了第一部新淮剧《照减不误》。你当时在剧中扮演是反面角色——地主的二奶奶，我扮演地主张百万，由于该剧主题鲜明，切合实际，大家在排练中尽了最大的努力，因此该剧演出后反响强烈，受到党政军各级领导的赞扬。延安和地方一些报纸对这次演出都作出了报道和评论。

我们还一起演出了淮剧《路遥知马力》，该剧后来被我国戏剧家阿英同志改编成独幕淮剧《渔滨河边》。你在淮剧《渔滨河边》中扮演“郑廷珍”一角，她是一位秀丽、纯朴的农村姑娘，当时我在剧中扮演顾乡长，你在演唱时把旧淮调过分悲伤的情绪缓慢的节奏，哀怨的韵律作了改革。让人感觉悦耳动听，深受群众的欢迎。后来我们又一起演出了反特剧“绝头路”、“懒龙伸腰”等，你都能根据剧情人物性格的特点，恰如其分地表现角色的内心世界，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夜晚演出没有扩音器，但你在演出时响亮悦耳的歌声几里路外都能听到。你的歌声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被当地老百姓称赞为“苏北的梅兰芳”。

1949年苏北军区文工团改编为苏南军区文工团后，文工团进入了大城市，演出的形式和任务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淮剧演出形式转变为音乐舞蹈和现代歌剧的形式。你因有孩子，团里同志下乡配合土改反霸进行演出，团里照顾你，让你留在城里。你为了使自己不掉队、不落伍，找来音乐理论书籍学习钻研，吊嗓子练习歌曲。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你参加了在无锡人民剧场的公演，参加了华东军区的文艺大会演，还得了奖，为团里争了光。

你参加赴朝鲜慰问团前夕，我因肺结核大出血进了医院，家里此时已有四个孩子，最小的才出生半年，你克服了重重困难，安排好家庭生活，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下坑道，上前沿，为志愿军战士送去我们江苏的民歌。

1953年你从部队转业，被组织调入江苏省歌舞团，你如鱼儿得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到歌舞团后，你处处以身作则，经常和团里的同志上山下乡，深入田头进行演出，从不怕苦怕累。你利用业余时间上夜校，学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你在和音乐家章枚（黄桥烧饼歌曲作者）以及南艺音乐教授黄友葵等在一起研究歌曲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请教。你经团里同意，赴上海歌剧院短期学习进修声乐，因在扬州演出时间耽搁，抵沪后才得知学院已开课多日，未能如愿。由于旅途疲劳，回宁途中发现小便出血，抵宁后你只奔鼓楼医院，家都未能回，就这样为了工作和事业，你不知劳累，不怕牺牲自己。

你一生热爱民歌事业、一辈子演唱江苏民歌，你演唱的《拔根芦柴花》、《杨柳青》等苏北民歌深受群众喜爱，也受到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褒奖。人们听到你的演唱，能感受到悦耳的声音，气息和韵味的默契，声音朴实无华，极富有苏北民间风味。你靠自己的勤奋和钻研，使自己的演唱风格独辟蹊径，用你的话来说：“吐字要如小猫吃小鱼有头有尾”，“字随腔走，如船行于水，要放的下、托的起、咬得住、送得出”，“音融于情，如鱼儿得水，要流畅自然，身临其境。”。从这些点滴经

验体现了你对事业的追求。你平时到各地演出时注意收集原生态的民歌。你和团里的同志多年来为团里收集民歌几百首，经过团里创作人员的改编和创作，为人民群众演唱了大量的江苏民歌，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和欢迎。

我们俩相亲相爱七十年，你总是对我照顾有加，平时演出再忙，只要有空你都会给我烧我最喜欢吃的菜。你离休后更是尽自己所能来照顾我的生活，逢年过节都要把孩子们叫回家，亲自下厨烧好吃的给大家吃。你家亲戚少，而我家兄弟姐妹多，亲戚也很多，你总是把双方亲友当成自己的亲人，热情招待，哪家亲戚有困难，都尽其所能帮助他们。

你离休后一直受到省演艺集团和省歌舞剧院领导的关怀和爱护，每次单位领导在百忙中来探望你，或者集团老干部处的领导和同志来家里送温暖时，你总感到过意不去，心里充满着感激之情。

亲爱的妻子，你高尚的人品，你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和对社会的无私奉献，你对家庭的贡献，对我和子女的爱是说不完也写不尽，你所有的一切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都将永远地留存在我和子女们记忆里，我们永远都思念你。

爱已久情已深，期盼今生长相守。

生如歌死如归，祈求来世再续缘。

你最亲爱的人 王东藩

2012-11-15



听不够的《拔根芦柴花》

◎ 苏南军区文工团战友 雷 磊

——怀念著名歌唱家、老战友雪飞

一位植根于淮海大地、成长于革命军中、花开于大江南北的歌唱家雪飞大姐走了，消息传来，跌足哀叹之余，那首由她演唱的名曲《拔根芦柴花》似在耳边反复回响……。

从闻歌识人到闻歌思人，中间经历了60多年的时空变幻。记忆中的雪飞大姐，生活中朴实无华，一登上舞台却风采无限。她不需要华服盛装，不需要铅华巧饰，只是素面朝天，仿佛从田头屋角走来的农家大姐，却不知倾倒了多少听众。在战争年代，那些从烽火战场上得胜归来的千万英雄战士，来不及洗去衣上征尘，便急着到广场去坐等文工团的演出，聆听“苏北梅兰芳”高歌一曲，就是对他们的最好犒赏。

雪飞是中国音协会员、江苏音协副主席、江苏省第五届政协委员、省歌舞话剧院副院长。1982年，上海唱片社从她历年演唱的近百首民歌中选出37首精品，录制后向全国发行。1997年，中国唱片社将她演唱的《拔根芦柴花》、《杨柳青》等收入《20世纪中华歌坛名人集珍藏版》。她对江苏民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雪飞十三岁就走上革命道路，为她从事地下党工作的父亲传送信息。后来曾在“抗大”五分校学习。43年参加阜宁县文工团，主演了一个反映减租减息的小戏。由于采用了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淮调，大受农民和战士们的欢迎。当时延安和一些地方报纸还作了报道和评论。从此声名鹊起。

在战争年代，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她也曾经多次受生与死的考验。抗日战争中，她被指派去前线向敌军喊话，展开政治攻势。被围困在据点里的敌军却企图借机突围，他们在焰火的掩护下举着大刀向雪飞她们的阵地冲杀过来，千钧一发之际，幸被我军另一支队伍及时救援并歼灭了敌人。1947年，雪飞被吸收入党。

到五十年代，她已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但因工作需要，经常外出参加各种演出。抗美援朝打响后，中央组织文艺界一批名人赴朝慰问，她也名列其中。接到任务后，她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所忧者，因丈夫，我们的团长王东藩身患重病住院，家中四个孩子，小四刚出生不久，嗷嗷待哺。这下可把一向爱家庭、重亲情的雪飞难住了。最终，在丈夫的积极支持和自己爱国热情的激励下，毅然随团出发，走上了当时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深入前沿阵地，为“最可爱的人”献上自己的歌，传递祖国人民的情。朝鲜战场的经历，成了她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回国后投入了大运河工地等慰问演出活动。

雪飞同志平时不讲空头理论，但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明辨是非毫不含糊。“文革”中，《拔根芦柴花》被诬为“黄色歌曲”而遭禁演，她和词曲改编者都被批斗。那些人要她写检讨，她却以“不会写！”作回敬，决不低头，别人也奈何她不得。

浩劫过后，她重返舞台时，观众对她火样的热情让她终生难忘，深感只有用歌声来报答观众的厚爱。

我们团是个人才荟萃的大团，在渡江前后的社会转型期，大家都有坚定的信念，思想很活跃。曾经围绕唱歌的发声方法，开展过一场学术争论，这就是所谓的“土洋之争”。在讨论中有人举“土嗓子”的成功典范雪飞来论证“土嗓子”（民歌唱法）优于“洋嗓子”的观点，双方相持不下，倒也热闹了一场。但雪飞几乎没有参加讨论，虽然她的群众基础确实无人可比，具有

明显的优势，她自己却并无优越感，也从不排斥他人，特别在渡江后面对新形势，她常迫切要求全面提高自己文化知识和专业理论修养，积极参加各种培训班，进修音乐理论，天天练嗓子，向“洋嗓子”们学习科学发声法，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的胸怀。

1953年转入地方后，她对民歌的演唱和研究确立了更高的目标，有机会就下乡采风，学习、搜集民歌小调秧歌号子，从渔樵乡民中汲取营养，不断充实自己。江苏省文化部门举办音乐舞蹈培训班，一批农村来的民歌手被选调到南京，从中发现并录制后加工整理出几首好歌，《拔根芦柴花》就是其中之一。此后她与这首歌结缘终生。1956年，她以这首歌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民间文艺调演大会上艳惊四座，倾倒全场。周总理后来在中南海看了她的演出后，让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巍峙到后台传话说，还想听听雪飞的淮调。她又献上一曲《刘桂英是朵大红花》。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到后台接见演员时对雪飞说：“你唱得很好。家乡的民歌真好听！”看来，歌声牵动总理的乡恩、乡情了……。

1985年，雪飞在即将离休前，曾带领省歌舞团前往滨海、响水、盐城、扬州、高邮等地作告别演出，以此答谢养育了她的这片土地和父老乡亲。此后，她就淡出舞台，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从闻歌识人到闻歌思人，我们经历了六十几年的时空变幻。现在想来，雪飞作为一个广受普罗大众喜爱的歌唱家，若是用什么“歌星”来称之，那是对她的不敬。她与那些高高悬在空中的“星”们根本不同点就在于“接地气”。

雪飞大姐如今已仙逝，那首“芦柴花”（原唱）好象也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了。

